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

A Transnational Topography for the Mig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Filipin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doi:10.29816/TARQSS.200212.0006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8), 2002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8), 2002

作者/Author：藍佩嘉(Pei-Chia Lan)

頁數/Page：169-21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2/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816/TARQSS.200212.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四十八期 2002年12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48, December 2002.

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 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

藍佩嘉

A Transnational Topography for the Mig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Filipin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by
Pei-Chia Lan

關鍵字：家務勞工、外籍勞工、認同、菲律賓

Keywords: Domestic worker, migrant worker, identification, the Philipp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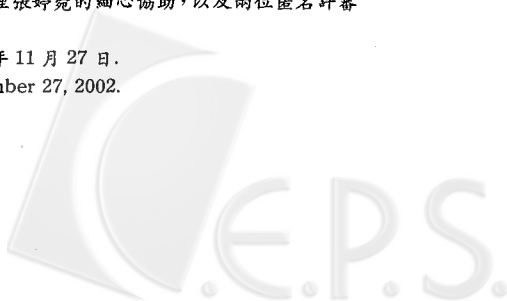
*僅以此文獻給田野中的菲律賓朋友，雖然學術文字難以見證她們予我的溫暖友誼與勇氣熱情。研究過程蒙受無數援手，特別感謝章薇、Ascension Lim 兩位修女。田野工作承蒙中研院社會所、蔣經國基金會的獎學金贊助，本文寫作則受惠於國科會的半年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從查某嫗、歐巴桑到菲傭：家務勞工在台灣的社会史考察」（計畫編號：NSC91-2412-H002-003）。我並要謝謝助理張婷苑的細心協助，以及兩位匿名評審的意見。

收稿日期：2002年7月1日；通過日期：2002年11月27日。

Received: July 1, 2002; in revised form: November 27, 2002.

通訊地址：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email: pclan@ntu.edu.tw



摘 要

本研究透過田野觀察與深入訪談的方式，探討菲律賓籍女性家務移工之跨國流動與階級認同。本文首先說明，菲律賓大量勞力移駐海外的政經脈絡，是與殖民背景、性別關係等社會文化因素密切連結。其次，我探討中產階級背景的非籍海外勞工，在從事低技術、污名化的海外家務工作時，要如何因應衝突的階級流動，並在日常生活中協商自我的身分認同。我發現她們透過社會空間的前後台區隔（工作日 vs. 放假日；母國 vs. 地主國）、隔離進行的勞動與消費活動、以及不同的時間向度（現在 vs. 未來），來形塑多重的角色扮演與流動的主體認同。

Abstract

Based on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Filipin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irst, I argue that the economic motivation to work abroad is mediat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colonial legacy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Second, I examine how Filipina migrant workers with a previous middle-class background deal with their contradictory class mobility, when taking on low-skilled, stigmatized domestic work. I found that they perform multiple roles and shifting identities through the front/backstage segregation in social space (working days vs. rest day; home country vs. host country)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emporal horizons (now vs. future).



1. 前言

2002年二月，我到菲律賓探訪兩年多不見的「菲傭」朋友。雖是台灣的晚冬，熱帶的島嶼仍是燥熱非常。我大汗淋漓地拖著行李走出馬尼拉機場，在倚著柵欄等待接機的混亂人潮裡尋找 Josie 的身影。

“Yvonne¹, here!” 我聽見熟悉的聲音，却幾乎認不出這是我在台灣認識的 Josie。頂著一頭染金的頭髮、穿著時髦套裝的她，給了我一個熱情的擁抱後，俐落地撥通手機，駕著九人座賓士的司機隨即過來接我們。Josie 在結束契約返台後開始經營仲介菲律賓國內女傭的生意，透過擔任按摩師的母親，接觸到中上階級的雇主家庭，又透過她家中雇用的女傭，到鄉下招募想到大都市幫傭的女人。她成功地結合雙邊的人脈轉化為不薄的利潤，經濟條件大為改善，單是她自己家裡就雇用了三名女傭和保母。Josie 開心地跟我談到，有一次在台灣一起工作的朋友打電話來，她的女傭說我家太太 (madam) 不在家，電話一端的朋友笑彎了腰：“Oh my God, Josie becomes a madam!”

雖然 Josie 的故事是個較極端的個案，但突顯出菲籍移民勞工之階級身分的曖昧性。像 Josie 一樣的非菲律賓女人，在台灣人的印象中，是每天晚上在人行道旁拎著垃圾袋的「菲傭」，是星期天在中山北路成群結黨的「外勞」。媒體的報導中，多把外籍勞工視為威脅社會治安、公共衛生的外來族群，官方的研究報告，則把外勞化約為勞動市場供需的統計數字。在相關的質化研究裡，雖然呈現較深刻的田野資料，內容多集中於菲籍家務勞工在台灣之勞雇關係及工作情形²。本文強調，對於遷移勞工³ 的生命經驗的理解，必須置於超越單一社會的分析

1. 在田野中為了便於讓菲律賓朋友記得我的名字，我使用發音較方便的英文名字，不過 Yvonne 其實是我在大學時代學法文時用的名字。

2. 朱明琴 (1996) 以深入報導的方式描述勞雇互動關係，林津如 (2000) 從女性主義角度檢視外傭政策，探討女人之間的剝削關係，林秀麗 (2000) 的分析重點在於家戶工作者之勞動力的買賣與監管。

座標，在地主國的社會地位與職業類別只是構成其階級身分或社會認同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引入多重的時間與空間的觀察面向。

有關國際移民的研究領域中，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取向，如推拉理論，從國際薪資水平的差異來解釋勞動力的流動；這樣的結構分析，已經被普遍批評為過度強調經濟力的主導，而忽略了形塑遷移過程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也化約了移民者的能動性 (agency)。為了彌補這樣的缺失，近年來的研究逐漸將焦點挪往中層 (mesostructural) 的分析層次，關照的是遷移過程之形成及其後果。所謂「跨國主義」或「宰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的學派強調移民在定居國外後，仍然維持與母國的經濟、政治、社會連帶，例如穩定而持續的匯款與投資，密切聯繫或交替居住的家庭親友，透過僑界團體發揮對母國政治的影響力等等。他們的生活空間是跨國度的社會場域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而國家與文化的認同也是雙重多元的 (Basch et al. 1994)。

除了中層的社會連帶分析，晚近的學者更進一步從微觀層次的主體性，來了解移動與認同的關係。Aihwa Ong (1999) 研究移居加州的香港商業移民，發現他們透過接受英國教育、講英文、培養文化品味等方式，企圖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以在移民國得到社會認可，然而，這些手持多本護照的亞洲大亨却仍在美國遭遇種族歧視。Rhacel Parrenas (2001) 研究的則是低階層的跨國移工—移居在洛杉磯及羅馬的菲律賓籍家務勞工，她們日常生活中經歷的是多重的流離失所 (dislocation)，在移居的土地上感覺社會地位向下流動並缺乏歸屬感，同時必須掙扎著維持與母國的家人、孩子的遠距連帶。以上兩

-
3. 在英文中多以 migrant worker 來描述，日文翻成「移駐勞工」，台灣坊間多以「外籍勞工」一詞稱呼，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名詞具有明顯的階級指涉，通常不包括多來自西方國家的白領專業外勞。有的研究者反對使用「外籍勞工」一詞，因為其中蘊含的國族主義預設(如吳挺鋒 1997)，我則認為此名詞突顯政治現實中以公民／他者為區分軸線的差別待遇。此外，菲律賓人一般多用 OCW (Overseas contract worker) 來稱呼在海外工作的契約勞工。在本文中我依脈絡交互使用「遷移勞工」、「跨國移工」、「外籍勞工」、「海外勞工」等名詞。

位學者分析的不僅是移民的制度過程，更是遷移過程中被活出來的經驗 (lived experiences)。兩人對於主體性 (subjectivity) 的討論，都受到 Foucault 的相當影響，她們視遷移作為一個主體形塑 (subject formation) 的過程，個人在遷移過程中既被制度環境約制其能動性、但也同時抗拒協商權力的運作。

上述文獻從不同的角度與個案，都指出在跨國界的流動與生活中，認同的形塑過程變為更加複雜與曖昧。遷移勞工所生活的跨國界社會場域，涵蓋的不只是非單一的地理空間，還有複數的社會階層化架構。遷移主體佔據了多重的社會位置，其認同也會依不同的社會時空、生活處境而流動轉變。在這樣的問題意識引導，本篇論文集集中探討兩個問題，第一，菲籍家務勞工的遷移決定與過程是受到怎樣的因素所影響，第二，當這些中產階級移工，在跨國旅程中面臨衝突的階級流動時，要如何因應並形塑自我的身分認同。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將透過生命故事、田野片段的呈現，說明菲律賓大量勞力移駐海外的政經脈絡，是與殖民背景、性別關係等社會文化因素密切連結。要回答第二個問題，我探討菲籍跨國移工如何透過社會空間的隔離、以及不同的時間向度，來協商她們的自我認同與角色扮演，以脫離被社會污名化的女傭身分。

2. 多重的認同版圖

在開始經驗現象的分析之前，我簡要地說明本文的概念系譜與理論問題。在後現代思潮的翻攪下，具有內在連貫性、現代理性的大寫自我 (Self) 已被撼動，近二十年來的學者轉而探討種族、性別、階級的差異政治，或者是擬像論述中流動不居的認同建構 (cf. Calhoun 1994; Lasch and Friedman 1992)。然而，認同概念在學界的高度濫用下，經常被物化為本質性的先存社會身分，或是淪為看不見制度基礎的個人表演。本文將 identity 一詞翻譯為「認同」，而非「身分」，就是要避免後者的靜態、範疇性的指涉，同時呼應近年來的社會學文

獻的概念反省，把焦點轉移到認同形構 (identification) 的歷史、動態過程 (Brubaker and Cooper 2000)。

要避免淪為學院喃喃自語的概念遊戲，我們必須從理論的高空落實到社會經驗的土壤，具體爬梳日常生活中的認同形塑過程。但面臨的難題是要如何研究認同？特別當認同被視為是流動的、多重的、片斷的？Andreas Glaeser (2000:11) 認為當我們把焦點從 identity 轉移到 identification，提供了一個經驗研究的問題焦點：「認同形構在跨越不同時間與社會情境間會有怎樣的持續性或可變性 (the durability or mutability of identifications across time and across social situations)」。他的研究探討東德與西德的警察在統一後，如何因應兩個相差甚巨的社經政治系統的整合，透過空間、時間的閱讀、使用與配置來指認我群與他群的相同與差異。這樣的分析取向，納入時間、空間、關係性 (relationality) 等面向，考察主體如何透過個人以及集體的敘事 (narratives) 來理解自己、導引行動 (Somers and Gibson 1994)。

Christena Nippert-Eng (1996) 從另一個不同的經驗場域，來探討認同形構的時間與空間框架。她訪問並觀察受雇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協商工作認同與非工作認同之間的疆域界線，並提出「自我的版圖」(territory of self) 的概念來描述個人如何透過我們的身體與週遭物質環境的關係，來建構特定界域的自我 (realm-specific selves)。她所研究的上班族，藉由辦公室佈置、穿著打扮、行事曆與電話簿的管理、談話內容、閱讀書籍、社交活動的安排，模塑了工作與家庭、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是整合或是區隔的關係，而這樣的社會時空的組織建構，也形成他們展現並鞏固不同界域自我的框架。

本文處理的認同，基本上以階級認同為主軸，然則現實中不可切割地同時銘刻著國族、性別等其他認同。傳統社會學對於階級的定義，承繼馬克思者觀照的是生產關係中的位置，韋伯以降者則是依據社經階層中的地位高低。它們的概念有所侷限，不只在於用範疇的方式來

定位階級認同，而且因為其參照框架限於單一社會而已。對於本文主題的跨國移工而言，她／他們的流動軌跡與生活範圍涵蓋跨國度的社會場域，其階級位置與認同也是由多重的時空座標所參照定義。如本文一開始所揭示，具有中產階級背景的非律賓籍遷移勞工，特別突顯了跨國流動之階級位置的曖昧性。

此外，在台灣工作的外籍家務勞工，由於她們的工作／生活型態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若干組織安排方式，使其成為展現多重認同版圖的重要個案。第一，她們全天候地居住於一個私人的家戶，個人的隱私空間或休息時間很容易受到雇主家庭的介入，放假外出的星期天因而成為她們重要的私領域。第二，由於台灣的外籍勞工係受雇於暫時性的契約，也沒有合法移民的可能，她們在地主國的生活被清楚地定位為暫時性、過渡性的。第三，多數跨國移工的家人仍然居住在母國，她們在地主國的工作生活與母國的家庭生活是地理空間上是完全區隔開來的。透過這個具有理論顯著性的個案，本研究將從時間與空間的版圖切割，勞動與消費的場域區隔等面向，來呈現遷移勞工之流動的社會位置與多重的認同形構。⁴

3. 研究背景與政經脈絡

東亞經濟體在經歷近數十年來的快速工業化後，其人口已由淨外移轉為淨遷入 (Skeldon 1992)。當代亞洲的跨國勞動力遷移反映了全球經濟再結構後的階層化國際地景。當紐約、倫敦、東京、洛杉磯等全球城市成為控制國際投資流動的端點 (Sassen 1992)，較低階的全球城市如香港、新加坡、台北，則交織於其中成為國際勞動分工空間分布上的控制節點 (Friedmann 1986)。這樣的結構環境刺激衍生了

4. 認同形構是一個自我與他者的區辨過程，當然與勞雇雙方的互動有密切的關係，但本文在有限的篇幅內不擬處理這個面向，我在另文中引用「畫界工作」(boundary work) 的概念來探討勞資之間關係性的互動，也呈現較多菲籍家務勞工之間的異質性，請參考 Lan 2002。

東亞地區兩類的外來勞動力：其一是多來自西方核心國的專業白領、管理階層，以及英語教師；其二則包括來自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遷移勞工，從事的是建築、勞力密集製造業、看護、家務勞動等職業（Findlay et al. 1998）。

台灣政府在九零年代初正式開放外籍勞工的引進，為國家建設工程以及失去國際競爭力的勞力密集產業，引進廉價的勞動力（吳挺鋒 1997，劉梅君 2000）。1992 年進一步開放引入家庭幫傭及監護工。此項政策係針對台灣社會在核心雙薪家庭擴張及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對照顧幼童、老人、病患等家庭成員之需求的大量增加。近十年來，台灣家庭僱用的外籍家務勞工之數量快速成長。現在已有超過十一萬名政府核准的外籍家務勞工⁵，其中九成來自菲律賓及印尼的女性（勞委會 2002）。

相對於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向上流動，菲律賓則在近二十年來面臨明顯的經濟衰退。在 1950 及 1960 年代，其經濟成長率曾經一度領先亞洲諸國。但由於政治腐敗以及內部動盪，再加上馬可仕政府採取高度仰賴輸出美國軍備、枉顧民生基本需求的經濟計畫，在越戰結束後造成菲律賓的經濟衰退（Espiritu 1995）。到了 1980 年代初期，政府大量舉債，披索大幅貶值，通貨膨脹高達 32%，三分之二的人口陷於貧窮（Constable 1997）。1974 年，馬可仕政府開始施行「勞力輸出政策」，此政策宣稱是一個用來舒緩高失業率的「暫時性的手段」，不過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來，海外勞工的匯款儼然已成為菲國主要的外匯來源，單在 1999 年間，菲律賓海外勞工匯入母國的金額高達 68 億美金（Asian Migrant Centre 2001）。

菲律賓政府一向高度地介入海外勞工的輸出，過去曾以國對國的雙邊契約方式引進大量勞工參與中東的建設工程。馬可仕政府一度禁

5. 由於家庭幫傭的配額已經凍結，只有監護工持續開放，許多家庭以偽造的醫療證件申請監護工，來照顧家務與小孩，因此本文使用「家務勞工」的通稱，也有其他研究稱之為「家務勞動者」（林津如 2000）或「家戶工作者」（林秀麗 2000）。

止私人仲介公司的運作，而由政府全面主導勞工的招募過程，甚至強制規定海外勞工必須匯回母國一定比例的薪資。⁶繼任的艾奎諾政府仍透過提高海外勞工貨運關稅、徵收手續費等方式從海外勞工身上謀取利潤 (Asis 1992)。相對於此，國家對海外勞工提供的保護非常有限，當海外勞工遭遇的虐待意外等事件不時傳出之際，菲律賓政府却只是象徵性地褒揚他／她們為「國家英雄」(national heroes)。

今日菲律賓是亞洲勞力輸出最大宗的國家，其在世界的排名亦僅次於墨西哥。官方資料統計，全球有三百多萬的菲律賓海外勞工，非政府組織估計，若加上無合法工作證的勞工以及婚姻移民，人數可能高達七百萬 (Asian Migrant Centre 2001)。菲律賓勞力輸出的主要目的地逐漸由北美、歐洲轉為中東及東亞。⁷台灣目前是菲律賓第四大的勞力輸出地 (佔 11%)，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 (33%)、香港 (15%) 及日本 (12%)。⁸

菲律賓勞工在全球勞動市場中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英文能力以及教育程度。由於美國殖民政府在菲律賓各地興建了相當數量的大學，大學畢業生佔全國人口的 9%，其教育水平高於其他同等經濟發展的國家。⁹菲律賓海外勞工，橫跨男女性別及雇用產業別，都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半數以上是大學畢業或肄業，其他三分之一為高中畢業 (NCRFW 1993)。然而，海外的的工作機會多集中於所謂 3D 的職業類型：低技術 (deskilled)、低賤 (demeaning)、危險

6. 馬可仕政府在 1982 年強制規定海外勞工必須經由菲律賓銀行匯回母國 50-70% 的薪資，海員甚至必須匯入 100% 的薪資，不遵守的勞工將無法更新護照，進而喪失出國權利。這項規定引起各地海外勞工的抗議，而在 1985 年後停止施行 (Constable 1997:164-5)。

7. 根據菲律賓政府公布的 2001 年菲籍海外勞工之人口統計，2001 年出國的 103 萬海外菲籍勞工人中，有 80% 前往中東及亞洲國家工作，10% 前往歐洲，7.6% 到北美。http://www.census.gov.ph/data/pressrelease/2002, 5/12/2002。

8. 資料來源同前。

9. 菲律賓政府統計局 (Census Bureau) 在 2001 公佈的資料，http://www.census.gov.ph/data，查於 May 12, 2002。

(dangerous)。

菲律賓海外勞工中接近半數為女性，大多擔任家庭幫傭、褓姆、看護、娛樂業等服務工作。在 1996 年，三分之一的海外菲籍勞工從事的是家務工作，其中 95% 由女性擔任，¹⁰換算起來，每三個出國工作的菲律賓女性中，有兩個是被安置在世界的某個角落裡照顧著一個外國家庭的日常作息，莫怪乎學者把她們的處境比喻作「為全球化服務的奴隸」(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Parrenas 2001)。

4. 研究方法與個案說明

本文取材於我的博士論文研究 (2000) 中的一部分，該計畫包括對菲籍女性家務勞工及台灣僱主之日常互動及社會認同的研究。我的主要田野工作進行於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7 月一年期間，包括對菲律賓勞工社群之民族誌觀察，以及對五十八位菲籍女性家務勞工之深度訪談。我在台北的一個以天主教會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擔任志工工作，包括教中文、協助勞工權益諮詢。每個星期天，我參與她們的聚會活動，如逛街購物、匯款寄包裹、生日聚餐、去迪斯可跳舞、唱卡拉 OK、在公園野餐，以及在速食店午餐等等。

為了進一步了解菲律賓遷移勞工在母國的生活，我在 1999 年四月及 2002 年二月至菲律賓進行兩次的田野旅行，每次歷時兩周，重點在於觀察仲介招募情形以及拜訪返鄉的菲籍勞工及他們的家庭。研究者的社會位置，無疑將形塑其觀察角度，以及與報導人 (informant) 的關係。我作為一個台灣公民，以及當時在美求學的身份，中介了田野中菲律賓朋友對我的理解與應對方式。我身為一個菲律賓社群中的外來者，或許侷限了感同身受的可能，但越界的研究過程也開展出觀察異文化的景深，而我自己跨越國界之生命經驗，也成為本研究背後隱

10. 根據菲律賓政府公布的 1996 年菲籍海外勞工之人口統計，<http://www.census.gov.ph/data/pressrelease/1996>。

而不見的參照點。¹¹

在 58 位受訪者中，其中 17 位只進行過單次的晤談（兩位在菲律賓、五位在雲林某鄉鎮、其他在台北縣市），與其餘報導人則在一年的田野期間內有定期的見面與聯繫，其中一些在我返美後仍透過電話、書信或電子郵件維持聯絡。訪談時間由 30 分鐘到 3 個小時不等，半數以上為全程錄音並逐字謄錄出來。由於我對於要佔據她們寶貴的休假時間來和我「闔室密談」感到不太自在，許多訪談是配合她們的活動作息，在吵雜及易被打擾的公共空間片斷地進行，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只以筆記輔助記錄。所有的訪問溝通都是以英語進行，本文引用時則被翻譯成中文。文中所有的名字皆為假名。

為了多樣化我的個案來源，受訪者中有六成來自我擔任志工的天主教社群，其他則透過其他的管道，包括雇主的介紹，以及外勞之間滾雪球的引見。在受訪當時，其中 52 位有合法的工作居留身份，有 6 位持旅行簽證逾期居留或是離開契約所載雇主另覓工作的所謂「逃跑外勞」。在年齡的分布上，有 33 位介於 31 至 40 歲之間，15 位是 20 多歲，10 位是 40 歲以上。她們的婚姻狀況亦不同，23 位是單身，20 位已婚，15 位則是離婚或寡居。

本研究的報導人多數為在大台北地區工作的菲律賓籍勞工，有必要簡單地闡述其個案特性與推論限制。國籍的挑選，主要是便於使用英文進行較深入的溝通。中產階級比例高的菲律賓籍移工，與其他國家的移工，如所謂的「印尼傭」，其在母國的社會背景以及在台灣的生活處境，都有不同，本文若干註腳對此有所說明，但詳細比較仍待後續研究做進一步的探索。外勞的處境當然也有城鄉的差異，在都會地區工作的外勞享有地利之便、豐富資源的集結空間，但是鄉鎮地區的外勞也經常利用假日到鄰近的主要城鎮，例如我訪問的五位在雲林某

11. 篇幅所限，我不擬在此對田野過程做太多反身性的討論，初步的說明可參考藍佩嘉 (2002)。

鄉鎮的監護工，放假時會搭公車到斗六聚會、採購。在斗六及其他地方，有不少嫁來台灣的東南亞女性開始經營販售家鄉雜貨、小吃的生意（不論有無正式店舖），提供了一個當地外勞聯繫的節點。

5. 她們為什麼變成「菲傭」？

大部分菲籍海外家務勞工在菲律賓並沒有從事類似工作的經驗。她們通常擁有不低的教育水準，在家鄉從事的是白領的工作。根據勞委會 1998 年的問卷調查（勞委會 1999），在台灣的外籍家務勞工（該年菲律賓籍佔了其中的 88%），近半數為高中畢業，38% 大學或專科畢業，2% 有研究所學位。本研究的 58 位受訪者（全為菲律賓勞工）中，有三分之一高中畢業，三分之一具大學學歷，其他則為專科或大學肄業。這些菲律賓女人為什麼選擇出國工作，即使從事的是一般社會認為缺乏技術與聲望的家務工作職業？本節將從三個交錯的面向來探討她們的流動軌跡，除了受到經濟因素的牽引，也受到文化認知的中介，以及性別關係的影響。

5.1 經濟誘因的再思考

當我問及：「為什麼你會想要出國工作？」十位菲籍移工中有九位毫不遲疑地給我相同的答案：「賺錢啊！在菲律賓沒有工作！」經濟誘因無疑是大部分勞工跨國移動的主要驅力。自 1981 年起，菲律賓的失業率已升高到超過 9% (Damaso 1991)，在 2002 年 7 月失業率持續飆高到 11%。¹² Trina 是一個年將四十的單身女性，她在高中畢業後已陸續在許多家工廠工作過，在波動的經濟狀況下，當地工廠倒閉的頻率很高，這樣的情形促使她至海外尋找較為穩定且收入較高的工作。Trina 描述她和表姐的出國動機：

12. 菲律賓政府國家統計部網頁：<http://www.census.gov.ph/data/sectordata>, 7/2/2002。

我們沒有工作。每兩三年工廠就會倒閉。在下一個 [工廠] 開始前幾個月我們沒有工作。這樣怎麼生活？所以在我二十八歲時到新加坡應徵工作。

解僱和失業的情形不只發生在菲律賓的藍領階級，同樣也改變了中產階級的命運。¹³Rosario 是一個大學畢業、四十多歲、兩個孩子的媽。當我問到她先前在菲律賓的職業，她神色尷尬且語帶遲疑地回答：

我很不好意思說……我以前在銀行工作。我在那裡工作了十二年。每個月的薪水只有 3,000 披索 [當時約 120 美元]，生活還過得去。但是七年前銀行倒了。當你來自一個破產的公司很難再找到新工作。所以我沒有選擇。我必須到國外工作。

「那裡沒有工作」的陳述指出在菲律賓升高的失業率；也暗指那裡沒有「好」工作提供足夠且穩定的薪水。在菲律賓中產階級的地位不再保證有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自 1980 年代中期經濟自由化後披索的貶值已造成實質薪資的大幅降低 (Basch et al. 1994)。相較於大都會區持高不下的生活費用，家庭收入的減少，造成收支無法平衡，包括中產階級的家庭也面臨同樣的困境。Vanessa，一個四十多歲有三位小孩的寡婦，對我解釋為何她辭去管理職位而到海外當女傭：

我過去在馬尼拉的大書店工作。但是薪水太低了。

每個月有多少錢？

7,000 披索 [當時約 230 美元]，包括加班。從早上十點工作到晚上十點。我在那裡工作了十八年！雖然我已經升到出納經理。我還是要放棄那個工作，在這裡做女傭，非常可惜……但是我沒有選擇。在菲律賓我每天工作再工作，還是負債！每個星期我拿到薪水 1,500，我走到市場，1,000 就花掉了。然後我必須借錢渡過這個星期的其他天。在馬尼拉的生活非常昂貴！在馬尼拉你每日

13. 在 1968 年，經濟危機的谷底期間，失業人口包括 277,000 大學畢業生，另外 284,000 人有受過部分大學教育。大學畢業生在 1990 年代的失業率估計維持類似的比率 (Abella 1993)。

大約需要 500。所以你出國。你為你的未來、你的家庭築一個夢想。
你想你可能賺到足夠的錢將來就可以有自己的生意。

經濟誘因的確主導了大部分遷移勞工的生命軌跡，然而，他們決定出國工作的考慮中，地主國與母國之間的薪資落差只是一項必要 (necessary) 的但非充分 (sufficient) 的條件 (Massey et al. 1998: 175)。Saskia Sassen (1988) 批評傳統的移民研究，只看到人口過剩、貧窮、經濟停滯等勞力來源國的內政問題。她強調移民的形成是一個全球性的過程，資本的移動與勞動力的遷移是全球經濟再結構過程中不可切割的整體。她也透過經濟資料的分析，發現外國資本進入第三世界國家，快速而大量地動員年輕的女性勞動力，破壞了當地的維生經濟以及傳統工作結構，也經常導致日後的失業與就業不足。當這些女人每天在外資工廠製造著 Levis 牛仔褲與 Nike 球鞋等產品，對於第一世界的生活型態與消費文化的想像，也間接造成了她們到海外工作的誘因。

的確，以菲律賓來說，它並不是亞洲最貧窮、人口過剩的國家，但它是亞洲大量的外流勞動力來源。統計數據也證明菲律賓的海外勞工的大宗不是來自貧窮地區，而是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區域。¹⁴先前研究也已經證明菲律賓的勞力流動是有選擇性的：最窮及長期失業的人很少出國工作，他們缺乏充分的動機、資訊與資源。國際勞動市場的招募過程中，取得優勢的是高教育、擁有若干技術、工作經驗、有企圖心及經濟資本的應徵者 (Alegado 1992)。

我認識的許多菲律賓勞工，決定到海外工作並非因為當前面臨急迫的經濟需求，而是為了孩子未來的福利預做準備。Naomi 過去在馬

14. 根據菲律賓政府 2002 年公布的 2001 年海外菲籍勞工調查，超過 60% 的海外菲籍勞工來自四個已發展地區 (全國十六區之中)，分別是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Metropolitan Manila) (19%)，Southern Tagalog (18%)，Central Luzon (13%)，and Ilocos (10%)。網頁：<http://www.census.gov.ph/data/pressrelease>，9/24/2002。

尼拉和先生一起在市場開肉舖。在三十初頭時，她來台灣工作以籌備她兩歲兒子將來的教育費用。Naomi 說明她決定出國的理由：「我要賺更多錢。這不代表我們沒有足夠的錢，但收養我的兒子後，我想我們賺的錢不足以撫養他。我們需要存錢以供他上大學，你了解嗎？」

像 Naomi 這樣的母親，期待透過她的遠赴重洋，能帶來下一代的向上流動以及未來家庭生活的改善。這樣一種對於目前生活的不滿，經常緣於和其他家庭的比較而衍生的相對剝奪感。當我走在菲律賓的一個小鎮上，沿路看到的多是簡單的泥牆或竹子屋，偶而看到一棟磚瓦透天洋房，以甚為誇耀的姿勢在農田旁聳立。旁邊的朋友理所當然地介紹說：「喔，這一家一定有人在海外工作。」在台灣與海外勞工的訪問中，我也不時聽到這樣的描述，「你問我為什麼想出國？我看到別人家家裡有 VCR，有冷氣機，所以我就想要應徵到台灣的工作！」¹⁵

這些片段已經清楚地呈現，勞動力的移動除了受到國外高薪資及國內經濟衰退的驅動外，還涉及其他因素的中介與交織影響，下面我會進一步討論遷移勞工的家庭性別關係、社會建構的成就及冒險，以及菲律賓當地對於「好的生活」的文化想像。

5.2 婚姻枷鎖與性別分工

Olivia 才三十歲初頭，却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她曾唸過兩年大學後因為財務困難而休學。十八歲時，她和她的姊姊一起去沙烏地阿拉伯做家庭幫傭。當她在菲律賓渡假時，遇到她的丈夫。當她回到沙烏地阿拉伯時，發現她已懷孕（在馬可仕時期的菲律賓，避孕藥物及設備的取得管道非常有限）。她在二十一歲辭去工作並結婚。她談到當時的決定充滿後悔：「我想保住我的小孩，但我不想和他結婚。我本來想要自己撫養小孩，但我媽媽哭著說假如我不結婚會有損我的名聲。

15. 據菲律賓政府 1994 年的研究指出，65% 的城市家庭擁有電視，14% 有錄放影機。在鄉村家庭只有 25% 擁有電視，7% 有錄放影機。菲律賓政府國家統計部的網頁：<http://www.census.gov.ph/data>，9/24/2002。

但看看現在的我——究竟是什麼損毀了我的名聲？」

在 Olivia 待在家裡當全職的家庭主婦八年後，她的業務員丈夫，爲了另一個女人離開她。由於離婚在菲律賓是不合法的，Olivia 退而其次想要申請合法的分居 (legal separation)，但合法分居只有在肢體暴力、亂倫、通姦¹⁶等前提下才被允許，而分居後的雙方也不能再婚。再者，申請合法分居必須耗費相當金額，官僚程序又龐雜，大部分的人因此只訴諸非正式分居或甚至不告而別。Olivia 渴望正式結束她的婚姻，她說：「我已經有好幾年沒看到他，但法律上他却還是我的丈夫，這實在不公平。菲律賓採用了美國所有的法律却不包括離婚這一項。我姊姊說也許我應該去加拿大工作然後取得那裡的公民權，這樣，我就能和我的丈夫離婚了。」

很多像 Olivia 這樣的單親媽媽，成爲海外家務工作的主要勞力來源。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有三位寡婦，還有十一位在丈夫外遇後成爲單親媽媽。如同大部分菲律賓家庭的女性戶長，Olivia 沒有得到丈夫財務上的任何支援。這是她決定再度去海外工作的原因：「我的丈夫沒有給我小孩一毛錢！所以我必須再度出國工作賺錢！一個女人在菲律賓很難找到工作，但却很容易在國外找到工作，你可以當幫傭、看護。」

Olivia 所說的「一個女人在菲律賓很難找到工作」，係由於菲律賓的勞力市場呈現職業分佈上的性別區隔以及男女不等的薪資差異。在「女性持家」(female domesticity) 的意識形態之下，女性被認爲是天生適於照顧兒童及家務，因而限制了她們的有酬勞動參與 (Isreal-Sobritchea 1990)。女性在勞動市場中通常受限於類似「妻子及母親角色」的範疇，例如農園的家務工作及護理、教育等專業工作 (Chant

16. 1988 年修定前的菲律賓家庭法，在定義通姦罪時有雙重性別標準。據此舊法，已婚女性可由單次的性行爲而判定通姦罪。但已婚男子可以與單身女性有性行爲而無罪，只要此單身女性是自願且私密的發生性行爲。男人只有公開與情婦同居才有罪名 (Go 1993:57-8)。

and McIlwaine 1995; Eviota 1992)。

除了財務上的原因，還有一些菲律賓女性到國外工作是為了逃離丈夫的家庭暴力、疏遠或外遇。¹⁷Rosemary 年近四十歲，是六個小孩的媽媽。她的丈夫嗜賭、酗酒，並忽視他的家庭。雖然 Rosemary 在馬尼拉有一個待遇尚佳的秘書工作，她決定要到台灣工作。想要逃離丈夫的強烈意願支持她熬過剛開始的幾個月：

在菲律賓我是坐辦公室的，我不知道怎麼做家務幫傭。我寫了很多信給我的爸媽，我說：「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待下去」〔苦笑〕。可是一旦我想到我先生，我跟自己說，喔，我要留在這裡，我一定要留在這裡，我不想再看到我先生。

已婚的菲律賓女人尋找海外工作以克服婚姻中的壓迫或是單親貧窮的壓力。弔詭的現實是，規範家務勞動之性別分工的父權邏輯，一方面限制女性參與當地勞動市場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却保留了菲律賓女人在全球勞力市場下的席位 (niche)，菲律賓女人比她們丈夫有更多機會得到海外的工作。在我接觸的個案中，大部分的菲律賓家庭有著相似的遷移模式：在 1980 年代，丈夫離開家中的妻子和小孩到中東工作。在 1990 年代則變成妻子到國外工作而丈夫和小孩留在菲律賓。如此的轉變是因為波斯灣戰爭時期及之後，中東地區以男性為主的建築和製造工作大量減少，相對地，其他地主國對於家務勞工的需求却不減反增 (Tarcoll 1996)。

Anamaria 在菲律賓是一名全職的家庭主婦，她的丈夫曾經在台灣工作，等到他約滿回家時，Anamaria 堅定地告訴他：「現在換我了，我要去台灣。我要體驗台灣。」當我問到過去當家庭主婦比起現在替台灣家庭打掃、煮飯有何異同時，她這樣回答：「在這裡工作和我在菲律賓家裡的工作沒什麼不同」，接著淘氣地笑說，「但我在這裡

17. 其他對於菲籍移民家務勞工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如在香港 (Chang and Groves 2000:83) 及羅馬 (Parrenas 2001:66)。

可以領到薪水！」像她這樣的菲律賓女人，從無酬的家庭主婦變成了「菲傭」，其實從事的是類似的工作，只是身處於不同的地理以及社會場域。做為家庭主婦，她們過去得到的只有情感價值而無實質報酬，現在變成了國際勞動市場上的薪資勞工。

當這些女人跨越國界，並跨越公私領域的界線，成為有酬的家務工作者時，她們不僅享有獨立的經濟收入，更成為家中主要的收入提供者。這樣的改變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夫妻間的權力關係，許多受訪者便戲稱她們目前在當「家庭主夫」的丈夫為“houseband”或“huswife”。然而，許多女性在獲得海外較高的薪資的同時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例如一些丈夫以妻子變得太過強勢、男性雄風受到威脅的理由，來解釋他們發生外遇的正當性。¹⁸同時，她們必須離開家鄉的子女，隻身前去照顧另一個家庭，忍受家庭分離的思鄉之苦。稍後我將討論她們如何藉由雇用菲律賓的當地女性，來維持跨國母職（transnational motherhood）（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的運作。

5.3 海外生活的文化想像

「是的，你需要一個假期，一個難得的好假期讓你進入世界，你曾經有過這樣的夢想，而我們可以快速地讓它實現。」當我在馬尼拉看到這個雜誌廣告時，我目瞪口呆。該廣告是用來招募菲律賓女性去日本做酒店公主、舞者、歌者，通稱為「娛樂員」（entertainer）。這類職業通常被聯想到性工作，返鄉的娛樂員也經常被當地人貼上賣淫的污名，然而這樣的海外工作機會却在廣告中被賦予浪漫的玫瑰色彩。另一個田野中的片刻，也讓我深刻體會到菲律賓人對於出國工作的矛盾社會認知。我在馬尼拉遇到 Cesar，一個曾在台灣工作的年輕菲

18. 我的另一篇文章（Lan 2003a），對於出國擔任家務勞工後造成其家庭及性別關係的影響，有較詳細的說明，並且對於有酬與無酬的家務勞動之間的連結，作進一步的理論化。

律賓男性，他在台工作一年後便決定不要續約而整裝回國，原因是身為一個專業的工程師，在台灣的工廠却被指派做一些不用技術的工作，他覺得很挫折也很丟人。在聽完他的長篇抱怨後，我問他是不是家中唯一在海外工作的成員。十分吊詭地，他竟帶著得意的笑容回答我：「是的，我就是那個幸運兒。」

雖然大部分海外工作的技術層級以及社會地位都不高，「出國」的機會仍吸引許多由於經濟能力的侷限而從未能夠出國求學或旅遊的菲律賓人。當問及出國工作的動機時，許多受訪者看待這趟旅程為一場冒險與探索：「這是我的一個冒險機會。」「我要體驗國外的生活。」「我從沒出過國，我想要看看國外的生活是如何。」「我因為好奇來這裡，我只是想要有這樣的經驗。」「已經有很多人出過國，我也想要有這樣的經驗。」

在國外工作的探索之旅，無論實際經驗是否符合他們先前的預期，出國的經歷已讓他們取得與留在菲律賓家鄉的鄰居親友不同的身分地位。我在台北的田野工作中，某個星期天和一群菲律賓移工在教堂閒聊，Johna 提到她的台灣僱主要去美國受訓二個月，他們正在考慮是要帶她一起去或讓她回菲律賓渡假。菲律賓同鄉 Adora 聽到了馬上熱心地提出建議：

Adora：不要回菲律賓啦！你應該和他們去美國！

PCL：但是如果她去美國，她可能只是整天待在家裡…

Adora：沒關係啊！只要你到了機場，你就算去了美國！然後你在家裡可以打電話告訴別人你在美國！[轉頭向我解釋] 因為在菲律賓的人很少有機會出國，所以你可以以出國為榮！

PCL：那到台灣呢？也覺得光榮嗎？

Adora：是啊，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在這裡照相。然後你可以告訴別人你出國，不是嘴巴說說而是有照片為證！所以 Johna，記得要在洛杉磯的機場拍照！

每個星期天，在中正紀念堂等觀光地點，或甚至是百貨公司的門

口，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外勞，特別是女性，正在擺姿勢照相。當我納悶為什麼這樣勤於拍照，田野中的菲律賓朋友總笑著說：“For the memory!” “To let my sweetheart see my fair skin!” 這些照片選擇性地紀錄了她們在台灣的生活，鏡頭下凍結的影像是她們穿著時髦打扮，如同快樂觀光客般地在現代的建築景觀前留影。她們對於淺膚色的偏好，象徵了對於優越的她者一都會的、中產的女性特質的想望。林秀麗（2000:43-4）在台中訪問的一個菲律賓籍女性外勞，她的姊姊說服她來台灣工作時甚至是以這樣的理由：「如果去台灣工作，皮膚會變得比較白，不會像原有的這麼黑」。用林秀麗的話，她們爭取海外的的工作機會同時是在「購買一種象徵現代性、富裕與女性化的身分」。

我在離馬尼拉三小時車程的小鎮上訪問到 Rocita。她曾在台灣工作一年，但雇主沒有續約，在付完仲介費及債務利息後她幾乎是空手而還。她的丈夫曾在帛琉做沒有合法工作證的建築工人，發生職業災害後負腳傷回來，已不能再從事體力工作。她的女兒最近到台灣的工廠工作，賺取全家的收入。在我們的訪談結束後，我告訴 Rocita 我想拍她的照片。她點頭說好然後逕自走向她表姐的房子，她的表姐利用出國工作收入重新粉刷過的混凝土房子。我問她，「為什麼不在你自己的房子前照相？」她不好意思地說，「我的房子？太簡陋了！下次我女兒寄錢回來建一個新房子後，我再讓你照！」

Rocita 的爸爸因早年加入美國海軍服務而取得美國的公民權，現在住在加州。¹⁹藉由她女兒在台灣工作的匯款，Rocita 和她的家人希望能夠達成全家取得美國公民權在美國團聚的夢想。她笑著告訴我，「我們沒有錢付去美國的機票。所以我們必須先出國工作好賺到機票錢！」

19. 本世紀初菲律賓境內設有大量的美國海外空軍及海軍基地。殖民時期及之後這些基地亦做為美國軍隊招募海外人力的中介站。自菲律賓於1946年獨立後，美國政府在1947年介入菲國的 Military Bases Agreement 條款同意海軍仍有招募菲律賓公民的權利 (Espiritu 1995:1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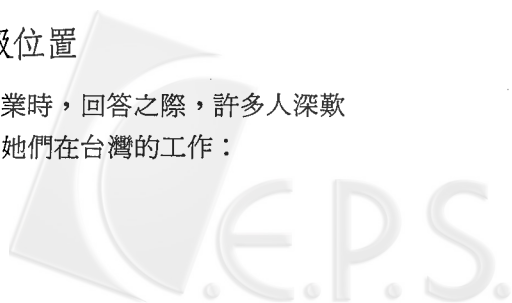
Rocita 的家庭成員，雖然前往不同的目的地，但享有一個相似的出國夢。這樣一種出國尋求更好生活的夢想，深植於菲律賓的文化及歷史脈絡。人類學家 Raul Pertierra (1992) 研究在北呂宋島的 Ilocano 省（菲律賓自本世紀開始向外遷移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地）對「好生活」(*naragsak a panagbiag*) 的文化建構。他發現移民的主要誘因並非追求立即的經濟報酬，而是為了維持某種生活品質，涵括一些難以量化的收益，如聲望、冒險及滿足感。當地人把外移 (out-migration) 浪漫化為對夢土的追求，而視本地為落後、不眷戀的居住地。

如此的文化建構亦受到菲律賓的學校教材的影響。高等教育在菲律賓相當普遍，這是受惠於二十世紀初美國殖民政府有系統的建立普遍的學校教育。然而，承繼於殖民者的教材，不免隱含了脫離本土脈絡的文化偏見。根據 Young (1980) 在 Ilocos 地區的研究，一般的地方課程內容對於維生經濟的農業工作給予不高的評價，反而偏好適於工業都市經濟生活的管理和技術。Young 指出，如此一來，培育出的學生多偏向離開地方社區，而嚮往在國外的富裕生活，特別是在昔日的殖民母國——美國。

雖然海外的工作機會幫助菲律賓勞工離開他們貧窮的家鄉，經歷某種冒險和自由，然而，在工作的現場，她們每天要面對的是性騷擾、虐待的風險，以及困居於僱主家中的高壓控制情境。返鄉的跨國移工，往往用旅遊者或探險家的口吻，描述國外的種種經歷與情景，隱而少言的海外工作的黑暗秘密，包括壓力、孤獨、不受尊重，種族歧視、隱私權被侵犯，以下我將進一步討論她們如何因應衝突的雙重階級位置。

6. 衝突的階級位置

當我探問受訪者她們在菲律賓的職業時，回答之際，許多人深歎了一口氣或用自我嘲諷的語氣來對照於她們在台灣的工作：



我的一個朋友過去是公務員，但是你知道她現在做什麼？她每天在洗雞肉！我常常說我在菲律賓是個經理，我現在則是管一個家的經理！〔Vanessa，過去是連鎖書店的管理者〕

菲律賓的朋友取笑我。他們說我過去的工具是筆和紙，而現在是菜刀、攪拌器、和砧板！〔Jorita，過去是高中老師〕

你了解我的感覺嗎？過去我家裡請個保母。現在我卻自己變成保母！〔Rosemary，先前是秘書〕

雖然海外工作大幅地提高了勞工的經濟所得，但從事的家務工作普遍被視為只要低技術及低教育程度的職業。Rhacel Parrenas (2001) 稱這種情況為「矛盾的階級流動」(contradictory class mobility)，雖然出國工作帶來薪資收入上的增加，從事低技術、污名化的家務工作却同時帶來社會地位的向下流動。遷移勞工所經驗的羞辱感受，不只是因為家庭幫傭這項職業的污名，更因為地主國的種族歧視。許多菲籍女傭在與雇主的互動經驗中，深刻感覺她們被視為是來自低等國家的劣等族群，例如下面兩位在訪問中所談到的：

Trina：大部分的菲律賓移工過去沒有這種經驗。我們在菲律賓不是女傭。我們之中甚至有些沒做過家事。

Maya：你知道在高雄的案例？那個受虐待的菲律賓女人？她在菲律賓是老師耶！她的僱主一定以為她很笨…

Trina：工作困難無所謂，主要是他們〔僱主〕不尊重你。

Maya：他們看不起我們。因為我們的國家很窮，我們變得很渺小。

〔因為我們的國家很窮，我們變得很渺小〕。此言生動地描繪出，世界體系中的國際不均發展，被轉換為日常互動中台灣僱主與外籍勞工間的階層差異。菲籍家務勞工不是唯一的一群經歷階級認同衝突的移民勞工。Mary Romero (1992) 和 Leslie Salzinger (1991) 分別研究在美國的拉丁移民家務勞工，兩人同樣發現，這些家務勞工大部分在母國持有中產階級的職業，為了擺脫「骯髒工作」(dirty work) 的標籤，她們試圖藉由非正式契約的建立來理性化勞動過程與工作條

件。然而，這樣的情節鮮少發生在台灣的非籍女性家務勞工身上，²⁰主要是因為她們與在美國的移民勞工面對不同的政策限制及工作環境。台灣政策限定了外勞的短期契約身份，並且禁止其轉換僱主，寄宿於僱主家的情況更局限了她們與僱主議價的能力。²¹雖然有一些外勞結盟為非正式的組織（如以地區為基礎的同鄉會、以休閒興趣結合的詩社、球隊、樂團、舞團等），對多數外勞而言，參加工會及其他政治性的結社組織具有被遣返的風險却只能帶來短期有限的利益。

那麼，這些曾經是中產階級的非籍女性勞工，當面臨在地主國向下流動的情形時，要如何因應她們衝突的階級位置，而協商她們的認同形構？我的研究中發現，菲籍女性家務勞工雖然難以透過集體的集結來提升她們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她們發展出較個人式的策略來提升其階級地位，藉由時空版圖的延伸來脫離（dissociate）目前身為外籍女傭的污名。我在以下陳述三個主要不同的實踐場域：她們將在台灣的日常生活區分為前台（工作日）與後台（星期天），在地主國與母國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地位，並且視在海外的家務工作為暫時並預期未來的向上流動。

6.1 前台與後台

Judith Rollins (1985) 在她對美國非裔家務勞工的經典研究中指出，家務勞工的關鍵工作內容之一是表演謙卑（deferential performance），包括以尊語稱呼雇主、不主動發言、謙遜的身體語言、在應對進退上儀式性地尊崇雇主的權威等等。住在雇主家中的家務勞工，必須「有個女傭的樣子」（acting like a maid）。英文的“acting”另有表演的語義，如果是「表演得像個女傭」，那麼表演之外的幕後

20. 少數例外的則是從事 part-time 清潔工作的「非法外勞」，她們得以迴避與雇主同住，並以較高的時薪從事清楚界定的工作內容，詳細討論請參見 Lan 2000。

21. 台灣政策對外勞造成的箝制，以及對於雇主管理方式的影響，可參考吳挺鋒（1997）、林津如（2000）、林秀麗（2000），以及我的論文的第三、五章（Lan 2000）。

角色又如何？

我借用 Ervin Goffman (1959) 的「前后台」戲劇學比喻來描述外籍家務勞工的雙重生活。Goffman 認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員，會持續因應不同的觀眾與情境，來維持自我的形象。而這樣的印象表演是有時空限制的，「前台」(front region) 指的是有觀眾在場、進行特定表演的區域，在前台受到抑制的某些行為則出現在「後台」(backstage)。運用到家務勞工的生活，前台是週一到週六、住在雇主的家中，她們的言行舉止必須符合觀眾－雇主－對於外籍女傭的期待，而展現服從、奉承及自我節制的一面。相對於此，放假外出的星期日構成了她們生活中的後台，可以離開雇主觀眾的目光／監視之外，展現角色外的不同形象。

James Scott (1990) 也發展出類似的一組概念，來彰顯從屬群體在統治者面前的表演，實是面對權力箝制時的應對抗拒之道。Scott 指出，像佃農、奴隸這樣的被高壓統治的社會群體，在統治者的面前往往照本宣科、虛與委蛇，亦即所謂的「公開劇本」(open transcript)，然而在遠離統治者的管控範圍之外，從屬團體在後台的言行舉止發展出另一套「隱蔽腳本」(hidden transcript)，透過玩笑、詩歌等日常論述，挑戰統治者的權威，並展現若干自由反抗的空間²²。

能夠放假外出²³的外籍家務勞工，通常在台北是這樣渡過了一個星期天：大清早，可能在趕著為雇主做完早餐之後，她們和朋友相約

22. Constable (1997) 和 Chin (1998) 的研究已援引 Scott 的這組概念來討論香港和吉隆坡的外籍家務勞工如何利用玩笑、假日換裝、偷打雇主電話等方式發展日常反抗的隱蔽腳本。我對於 Scott 的中文譯介，部分參考了吳介民 (2002) 的文筆。

23. 有相當比例的外籍家務勞工，特別是印尼籍監護工，是鮮有機會放假外出的。她們面臨的是更高壓的前台控制，享有更有限的隱私權與後台空間。當然，前台的區域也是有可能透過若干方式被行動者轉化成後台 (Goffman 1959:129)。例如，有些家務勞工被安排住在半透明的和室、客廳角落，她們可能透過家具的配置阻擋、海報張貼等方式來增加居住空間的隱密性，以抗拒雇主的監控偷窺。此外，倒垃圾、陪照顧對象去醫院等工作時刻，也經常被轉化為外勞聯誼集結的場域，外勞之間普遍使用的手機，更透過電訊網路形成「虛擬後台」(virtual backstage)。

在教堂一起參加彌撒。之後她們到菲律賓首都銀行匯款回家、或是中山北路上菲僑經營的小型貨運公司託運要寄給家人的錢或禮物。午餐在菲律賓小吃店打牙祭，或是帶著自製的家鄉食物在公園野餐。飯後，有的人參加教堂舉辦的查經班、合唱團、球隊練習，或只是在教堂院子裡聯誼聊天。其他人則去逛街購物、在觀光景點照相，或是到以菲籍外勞為主要顧客的卡拉 OK 和迪斯可舞廳。有幾家舞廳甚至提供免費的公車服務，直接接送他們往返教堂及舞廳之間。這些活動之後剩餘的時間裡，除了打電話給菲律賓的家人外，她們則三兩聚在美式速食店或群坐在台北車站的地板上，消磨最後的自由時光。

台北中山北路的聖多福教堂一帶，是菲籍勞工在台灣最大規模的聚集地。除了英語服務外，教堂現在提供 Tagalog 彌撒給星期天逐漸增加的菲籍教徒。據那裡的神父評估，每星期至少有 3,000 人參加彌撒。星期天的街上滿是台灣及菲律賓的小販，販賣各種商品，包括菲律賓報紙、雜誌、CD、錄音帶、Tagalog 的羅曼史小說、成衣、內衣、珠寶飾品、化妝品、行李袋、被單，甚至是二手電腦。教堂後的巷子或是週遭的小店，則提供了菲律賓海外勞工各式家鄉小吃及低成本的服務，像剪髮、修指甲、燙髮。²⁴

休息日的打扮是他們穿梭於前後台之間轉換身份的鮮明象徵。雖然鮮聞有台灣僱主如同一些白人或香港僱主要求他們的家庭幫傭穿制服工作 (Rollins 1985; Constable 1997)，台灣仲介或僱主給予外籍女傭的工作規則中通常會規定工作時不可以化妝、戴首飾、塗指甲油，或擦香水。受訪的菲籍勞工也有意識地「裝醜」，大部分穿著簡單的 T 恤配上百慕達短褲或寬鬆長褲。如此含蓄的穿著打扮（「乾淨樸素」）強調她們卑下的女傭地位並壓抑她們的女人味，以免女主人感到威脅，擔心男主人的外遇。

24. 由於警察對於街頭攤販的取締，許多的外勞生意最近已移入附近的晴光商場。大部分店家是由菲律賓華僑或台菲通婚的夫妻經營。

當外籍家務勞工星期天出門時，她們離開了雇主的管轄範圍，換穿緊身 T 恤、迷你裙、名牌牛仔褲，塗上彩妝指甲油、戴了耳環項鍊。透過這些有形的裝飾，來妝扮出一個截然不同於她們在僱主家工作時的形象。這樣一種有流行感與女人味的造型，是對於女傭與女主人的角色翻轉，例如，她們經常用這種方式戲謔的讚美朋友的打扮：“You look like our madam! (「你看起來好像我們老闆娘!)」，同時，也在緬懷她們過去在菲律賓的粉領形象與中產生活。在一個星期天的彌撒後，我和 Luisa 還有數位菲律賓女性一起去吃午餐。在速食店時裡，我看到一個裝了衣服的袋子，我隨口問 Luisa 是否剛剛去購物。她搖頭，略帶尷尬的笑著對我解釋：

不，這些是我回家前要換的衣服。我出門時，希望看起來聰明、時髦。穿上這些衣服〔指著她身上穿的〕我看起來像個企業經理 (business manager)。那些衣服〔指袋子裡的〕是我在市場買的，只要台幣一百元！穿那些衣服看起來像家戶管理員 (house manager) [大笑]！所以我回家前要換衣服，卸妝、換掉迷你裙……我在家裡的打扮像是另外一個人〔苦笑〕。

除了裝扮形象上的差異，外籍家務勞工在星期天的後台活動，也和他們在工作時的謙卑表演呈現了戲劇性的落差。平日她們只能配合雇主的飲食偏好，沒有烹煮自己喜歡的食物自主權，多數人必須在廚房孤零零地進食，有些人因為僱主吝嗇於提供充分的食物種類或份量而挨餓，有些人甚至被迫要接受僱主出外用餐帶回來的剩菜剩飯而感覺屈辱。星期天則成她們享受盛宴的一天，外勞們可以結夥成群在小吃店自由購買家鄉食物來滿足她們思鄉的腸胃。透過假日的飲食行為，外勞得以重建她們在工作中被抹煞的個人自主性，以及集體性的族群認同。²⁵此外，在星期天後台與「自己人」的交談中，有些外勞會

25. 有些印尼籍家務勞工，在台灣雇主家中被迫吃豬肉、或烹煮豬肉、用米酒調味，這是違反回教徒嚴禁飲酒、食用豬肉或非誦經屠宰的牲畜等戒律。她們在放假時食用 halal (合乎律法的) 食物，成為維持其族群與宗教認同的重要實踐。

嘲弄批評台灣雇主的餐桌禮儀和飲食品味，以質疑顛覆雇主基於階級或族群的優越宣稱。例如，某個星期天在教堂，Jamie 問我：「“fried rice” 你們說 “chow-fan,” right? 菲律賓人只在早餐的時候吃炒飯，可是我的雇主却叫我炒飯當晚餐！然後他們覺得我們菲律賓人窮？我們可是吃真的晚餐，才不吃炒飯呢，而台灣人還覺得他們算什麼社會名流 (socialites)!?»

許多雇主會把穿舊的衣服、用過的玩具當作「禮物」送給雇主眼中為貧窮所困的外籍女傭，這些二手貨就算陳舊不實用，家務勞工礙於雇主權威也不能加以回絕 (Rollins 1985; Romero 1992)。相對於此，星期天的消費活動則是讓他們在後台自我培力 (empowered) 的一種方法。雖然在台灣購物消費並不比菲律賓便宜，但逛街購物為家務勞工帶來一種自主的尊嚴、心理上的滿足感，也是一種女性經濟獨立的佐證。例如，Maria 在來台灣工作之前，在菲律賓是全職的家庭主婦，訪問時，她一面用手撥弄著耳上懸掛的金耳環，一面向我解釋出國工作的收益與成本：「在國外工作很困難，但你賺到很多錢。現在我可以買我自己想要的東西。在菲律賓，要靠我丈夫的薪水，而且也不夠買我現在有的東西。」

在前台的「公開劇本」裡，家務勞工還必須「裝笨」以彰顯雇主的優越，並適時地對雇主（特別是女主人的打扮穿著）提出讚美。在星期天的後台，她們交換僱主的軼聞趣事和家庭秘密（例如洗衣服時在男主人口袋裡發現保險套）。高學歷的菲律賓勞工，更經常交換分享雇主因為文法或發音錯誤而發生的各種笑話²⁶。她們在後台的「隱蔽腳本」中，強調我群（菲律賓人）相對於他群（台灣人）較為優越的英

26. 在高學歷的菲籍家務勞工與台灣雇主的日常互動中，英文的使用與溝通構成了象徵鬥爭 (symbolic struggles) 的一個重要場域。請參考我的另一篇文章 (Lan 2003b)，討論英文作為強勢的全球語言，如何成為一種權力支配的媒介，以及菲勞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運用殖民者傳留的語言資本 (linguistic capital)，作為海外工作時的抗爭資源。

文能力，想像與第一世界英語國家的親近性，透過這些對雇主的譏弄嘲諷，逆轉了雇主與女傭之間的階層地位。我在雲林鄉下訪問到的一名菲律賓籍監護工，有著大學學歷的 Sylvia 雖然在前台扮演著謙恭女傭的角色，但她在訪談中清楚地陳述她心裡的想法——不是她太笨學不會台語，而是雇主太笨英文不通。相對於台灣，以英文為官方語言的加拿大是更有吸引力的遷移目的地：

他們要我教小孩英文，可是我得先學台語。他們說如果我不學台語，就算我是大學生我還是很笨。你不要跟他們說喔，他們才笨哩，英文在這裡一點用也沒有。也許我應該去加拿大，我不想學台語，太難了。

此外，相對於平常孤立隔離的工作狀況，星期天成為外勞社群集聚的時機場合，她們得以交換有關勞工權益的政令資訊、或是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策略，更重要的是，她們提供情感上的相互支援，伏在彼此的肩頭上哭泣，或相互揶揄「身為女傭」而開懷大笑。當我和一群菲律賓女人在星期天的公園野餐時，Nora 對我和其他人開玩笑：「我以前不會跳舞喔。但我開始當家務幫傭以後，我放假回到菲律賓，我妹妹說，『哇，你現在懂得怎麼跳舞了。』」然後 Nora 誇張地搖著屁股模仿拖地的動作，「因為我每天做這個，肚子都沒有贅肉了！」

跟中山北路、台北火車站類似的外勞集結的「周末聚落」(weekend enclave) 也出現在亞洲其他地主國，如新加坡的 Lucky Plaza 香港的中環。新加坡的地理學者 Brenda Yeoh 和 Shirlena Huang (1998) 指出，對於寄宿於雇主家的外籍家務勞工而言，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的界定有著複雜交替的關係。她們所寄宿的私人家戶，反而成為充滿監控窺視的前台、隱私權經常受到侵犯的公領域。很諷刺地，在星期天，如火車站及公園這種遠離雇主的公共空間，反而能夠保障她們較多的隱私及個人自由。公共空間的後台，讓她們能夠維持一個可以不同於工作時的女傭身分，並在同鄉的社群中獲得集體歸屬感以及自主的空間。

像這樣的公共空間的私人化，是社會資源匱乏的社會群體不得不然的空間策略。這樣的方式對於一些菲籍跨國移工，特別是過去持有中產階級背景的，不免引起自我認同上的焦慮。Maria 剛來台灣幾個月的時候，Adora 和我帶她去台北車站。當我們走過許多席地而坐的菲律賓人時，Maria 相當緊張而且驚訝，她緊握著我的手、在我耳邊細聲地說：「我不喜歡看到這樣，我們看起來好像窮人。」Adora 安慰她：「我以前也有和你完全一樣的感覺，可是一旦我加入他們，我就成爲他們其中一分子，這就只是另一種野餐嘛。」

然而，外勞星期天的「野餐」却引起不少台灣民眾的微詞。我和外勞朋友在兒童樂園、火車站席地而坐聚會時，不時目睹領受路過台灣民眾的蔑視眼神、或刻意迴避的目光。一位台北市議員在台北車站對 272 個台灣籍旅客進行調查，其中有 76% 的人對星期天外勞製造的噪音和混亂感覺「噁心」或感覺很「壞」，有 90% 看待此一現象爲「不良的次文化」，會破壞火車站作爲台北地標的現代形象。²⁷在聖多福教堂附近的地方居民也對外勞製造的噪音和髒亂有所抱怨，幾度投書報紙，用激動的言詞抗議外勞星期天的聚集嚴重破壞了社區的生活品質和安全。²⁸

這樣的抱怨，與其說是基於公共衛生安全的考量，更多是因爲外籍勞工把台灣的公共空間「後台化」，所導致不安與焦慮。一個台灣僱主在訪問中提到當他星期天早上搭著經過聖多福教堂路線的公車：「你相信嗎，那天我是公車上唯一台灣乘客！我感覺很怪，甚至有點害怕！那時我真的懷疑究竟我身在哪裡？」如此恐懼感的浮現，是因爲多數者變成少數者，主導者的前台變成弱勢者的後台，我們被他者「入侵」。簡言之，「我們與他們的界線被入侵，並翻轉了『自我』與『他者』的位置。」(Yeoh and Huang 1998:593)。勞委會及一些地

27. *Taiwan News* (Taipei) 11 June, 2000.

28. 中國時報民意論壇，1999 年二月八日與同年四月六日。

方政府都曾經提出管理外勞休閒生活的議案，如規劃特定場所，遷移外勞到封閉性較高的地方（吳挺鋒，1997:107）。其基本動機便在於維持我群與他者的隔離，並侷限外勞的公共後台，以維持有效的監控管理。

後台區域的界線不只是藉由地理空間的侷限，也包括時間的界定。大部分僱主會明訂外籍勞工的收假時間，規定時間從五點到九點不等。她們通常都在外面撐到最後一刻才願意回雇主家，即使是在附近打公共電話給朋友也好。一個星期天傍晚，當 Claudia 和我坐在人行道的椅子上消磨最後的一小時，我揉著整日在城市中間逛後酸痛的腿，跟 Claudia 說：「喔，你們實在有夠了不起。每次我跟你們出來，我總是累斃了。我不敢相信你們早上六點就出門，直到回去的前一刻却還是這樣精力充沛！」Claudia 回答我：「你知道實情是什麼？我們很累，但是當你想到你必須要再等六天或者更多天才能見到這些朋友，你不想回去！所以你盡情地玩！你不再感到累！就像是灰姑娘一樣。明天，你要回到另一種生活！」

對這些灰姑娘來說，除了要盡量延長在後台活動的時間，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地隔離前台與後台，以避免雇主看到她們女傭角色外的活動與形象，也就是 Goffman 所說的「前台到後台的通道必須被封閉，或是整個後台都被掩藏起來不被觀眾看到」（1959:113）。²⁹好幾次我跟著菲律賓朋友去迪斯可，要離開之際，她們紛紛拿出事先準備好的 T 恤，來替換掉身上的衣服。看到我一臉困惶，她們笑著對我解釋：「因為衣服沾了煙味！換了衣服，我的雇主才會以為我去的是教堂，不是

29. 要說明的是，也有一些高學歷的菲籍家務勞工，刻意的消弭前台與後台的區隔，強調她們與台灣雇主的平等地位，她們在前台刻意表演出與女傭角色不符的行為，例如看 CNN，聽古典音樂，主動與雇主聊天，甚至糾正雇主的英文，希望藉此得到雇主的尊重。這樣的個案的工作內容通常是以照顧老人或小孩為主（而非家事工作），由於工作性質牽涉到較多的情緒勞動，雇主對於外籍勞工的背景希望有較多的了解，也較能接受階層關係不明顯的勞雇關係（Lan 2002a）。

迪斯可！」如果無法維持前后台的區隔，隔離雇主於後台之外，可能會為菲籍家務勞工帶來工作上的風險。前面提到的 Luisa，通常都會攜帶她的亮麗服飾和化妝品到教堂的洗手間來梳妝更換，以免她的雇主看到她的後台裝扮，有一次因為她的雇主出國，她索性就在家畫好妝、染了髮、穿著迷你裙直接出門，結果是這樣的：

我的鄰居在電梯裡遇到我並且聞到我的香水味。整棟樓都開始八卦！他們告訴我的雇主說：「Luisa 那天出門，看起來像個電影明星！」，我雇主不相信，大樓守衛還把電梯裡的錄影帶調出來給她看！

那妳的雇主什麼反應？

她很驚訝啊，因為我跟平常看起來不一樣，我想她覺得很沒有安全感吧。她就跟我說：「我沒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因為沒有必要，我都待在家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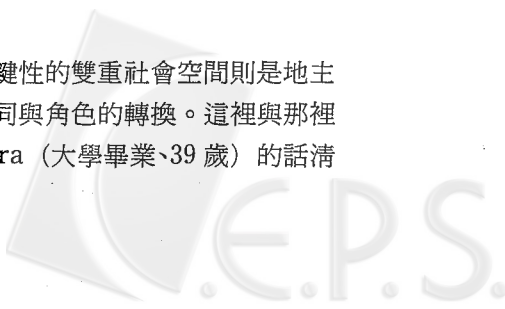
她想要跟你說什麼啊？

她是在告訴我，我不需要這些衣服，因為我都待在家裡，我只是在浪費我的錢！

外籍家務勞工雖然居住在隱私權受侵犯的生活空間，以及經常面臨被剝奪自主尊嚴的工作條件，但她們並非被動的受難者，藉由前后台社會空間的區隔，她們維持情境式的互動表演，以協商她們多重的認同。然而，午夜的鐘響仍是掌握在握有權力的雇主手中，如同灰姑娘回到廚房，馬車變回南瓜，外籍家務勞工在假日結束、回到雇主家後，只得卸下妝、關掉手機、換下炫麗的衣裝，改穿謙卑的圍裙。

6.2 這裡和那裡

對於海外家務勞工而言，另一組關鍵性的雙重社會空間則是地主國與母國。身體與工作的移動，帶來認同與角色的轉換。這裡與那裡的明確區隔，可以用以下這位報導人 Nora（大學畢業、39 歲）的話清楚地呈現：



既然你已經來到這裡了，你不應該還整天在說你在菲律賓是不是有車、有女傭。假如你在菲律賓已經擁有一切，你幹嘛來這裡？不要大嘴巴。現在你在這裡，你需要服從這裡的規矩。你是一個家庭幫傭；你必須做任何事。你不能抱怨你不知道如何做這做那。

在上節中，我描述了菲律賓家務勞工在台灣的生活中心維持了工作日／前台與放假日／後台的區隔，這裡／地主國與那裡／母國的空間區隔，對她們構成了另一組前台與後台。海外家務勞工在第一組的前台中，面對雇主觀眾，扮演女傭，於第二組的前台，家鄉的親友成了觀眾，她們扮演的角色則是成功致富的海外英雄。同樣地，她們必須隔離前台與後台，不讓前台的觀眾看到她們在後台的情形，也就是在台灣工作的實際狀況。不少菲籍海外勞工對她們在菲律賓的朋友或舊識用模糊方式交代，甚至完全隱藏她們在台灣真實的處境，如一位受訪者？：

我在台北的街上遇到一個菲律賓的鄰居。她是老師。她叫我不告訴其他人在台灣看到她。很多人甚至不告訴她們的家人和朋友在台灣做什麼。他們不知道我們只是在洗碗和洗狗！

透過菲律賓與台灣之間的地理區隔，海外勞工得以在兩者間維持一個前後台的隔離。藉由這樣的地理社會空間的區隔，她們得以維持雙重的個人認同與社會角色。以 Lucy 為例，她是一個 30 歲大學畢業的菲律賓女性，當我第一次邀請她進行訪談時，她問我：「你會在報紙上登出來嗎？上次有一些記者來，修女要我讓他們照張相。我說『不不不，我可不要讓我在菲律賓的朋友看到我在台灣拖地！』。」而後，Lucy 告訴最近她必須做更多「有氧舞蹈」(aerobics，她們用來暱稱兼職的清潔工作)，因為她必須寄 100 美元去贊助高中的同學會。我問為什麼她不能參加同學會還要寄錢，她這樣回答：「他們在為學校整修捐款。OCWs (overseas contract workers 海外契約工) 是主要的募款對象。因為我們在國外工作，他們覺得我們賺更多錢，我們應該

捐更多。」

海外勞工除了試著隱藏後台的黑暗面以維持出國工作的光彩，要在前台扮演成功致富的海外英雄，最重要的劇碼是透過有形的物質消費，來展現經濟能力以及社會地位的改變。改建水泥房子、購買現代家電，讓小孩讀私立學校、擁有進口玩具，這些象徵現代性、全球性的物質實踐，突顯出 OCW 與其他從未出國的菲律賓鄉民的差別。星期天的中華路擠滿了外勞，DVD 是最受歡迎的產品之一，馬尼拉國際機場的行李運送帶總是塞滿了海外勞工度假或歸國時寄運的大型紙箱，許多台灣的家電行甚至強調他們的產品在菲律賓也可享有一年的保固期。

對於跨國移工而言，度假是脫離繁重工作、返鄉探望家人的難得機會，然而，短短的一兩個星期的假期，往往花費她們相當的金錢。有些移工甚至害怕這樣的「大失血」，而放棄假期。打算回家度假的移工，通常數週前就要開始有計畫地準備給親朋好友的禮物或是現金，聽說有 OCW 要回來，甚至是街坊鄰居，也都前來湊熱鬧，也不能免俗失禮地送上台幣幾十塊的小禮物。Madeline 跟我解釋這樣的送禮行為實在是面臨社會壓力而身不由己：

你知道，別人想你在國外工作一定很有錢。所以假如你沒有帶錢回家，他們會笑你：「這算哪們子出國？」你必須買田、買房子、開店做生意。〔無奈地聳聳肩〕這是菲律賓人的生活方式。

海外勞工的財力展示，經常是面對觀眾期待的不得已表演。除了返鄉度假要送禮，在國外工作時，也要面對來自母國的各式各樣募款、借錢的要求，例如親戚小孩的學費、母校的募款、甚至是鄰居的生日宴會。面對這樣的請託，海外勞工往往覺得很難全然拒絕，一方面是有丟臉 (losing face) 的社會壓力，如果不能滿足這樣的財務需求，意味著她們的海外淘金夢的失敗。

另一方面，由於延伸家庭的親族關係在菲律賓仍然具有重要的經濟共享與社會連繫的功能，彼此的財務支援具有一定的道德規範力，

具現於當地的文化價值 *utang na loob*，意指家人之間終生的債務 (Parrenas 2001:117)。學者描述菲律賓的家庭為「核心家庭的居住形式但具有延伸家庭的功能」(residentially nuclear but functionally extended) (Chant and McIlwaine 1995; Medina 1991)：雖然經歷都市化及工業化後，核心家庭已成為菲律賓的主要家戶類型，但不管家族成員遷移多遠，家族成員間彼此的支援照應，仍深植於其文化觀。許多單身的菲籍女性海外勞工都將大部分的薪水匯回菲律賓的家中，並支付其弟妹的學費。例如，二十多歲、單身的 Mercy，在一年的大學生活後開始出國工作：

我姐姐打電話給我並問我是否要去新加坡工作。我說沒問題，因為我要幫助我的家庭。我姐姐說「別擔心，我們有五個姐妹在這裡工作。」

你現在每個月寄多少錢回家？

我全部的薪水！因為我姐姐老了，她需要為自己存錢。過去我姐姐幫助我受教育，現在我支援我妹妹的大學學費。這對我來說不成問題。我們姐妹間彼此協議。她付電話費，我付妹妹的學費。

海外勞工承受的道德性的財務壓力之沉重，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灣的雇主常有強制儲蓄的做法，也就是在外勞的薪水中扣除三到五千，這筆扣款一直要到外勞約滿離境時才會歸還，以此防止外勞「逃跑」。這項陋規明顯違反勞基法、剝奪勞工掌控其薪資的權利，儲存的程序也易生弊端。³⁰我認識的大多數移工都反對這樣的一種以儲蓄之名、行控制之實的做法，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有幾位竟然認為還不錯，理由是藉此她們才可能規避家鄉的索款或借貸壓力，存下自己的錢。在菲律賓有兩個孩子的 Angelina，這樣告訴我：

我覺得〔強制〕儲蓄很好，因為如果沒有儲蓄，我就得把所有的

30.如 1999 年關廠的擊揚電子，未以外勞名義開戶存儲生息，以致關廠時積欠外勞大筆儲蓄金。過去的勞委會曾以行政命令允許資方在勞方同意的前提下得扣除儲蓄金，新政府則在最近的修法中明文禁止，但實際約束效果仍有待觀察。

錢寄回家，當我約滿以後，我自己一毛也沒有！不管我寄多寄少，他們〔家人〕總是說不夠不夠、再多寄一點！再多寄一點！

海外勞工在母國與地主國維持前台與後台的區分，而事實上，她們之中的許多人也的確在兩地擁有極為不同的階級位置——她們在國外是女傭，却是家鄉的女主人。在訪談中，數位菲籍女性家務勞工以驕傲或尷尬的語調告訴我：「你知道嗎，我在菲律賓有女傭！」Christina 就是其中之一。大學畢業的她，原本在菲律賓當老師，在台灣工作期間，她僱用一個當地的菲律賓女人寄宿在她家中照顧小孩及家務。雖然她們在不同的地方從事相似的職業，Christina 在訪談中強調她自己和她的女傭截然不同的：「我的姐妹笑我，你在菲律賓有女傭，但你在台灣是個女傭！我說這不一樣。他們教育程度低，不是每個人可以到國外工作的，你必須非常認真、堅決。」

Rhacel Parrenas (2001) 在對菲律賓家務勞工在洛杉磯和羅馬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發現，她指出像 Christina 這樣的女人處於多層次的「再生產勞動的國際分工」(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 中的中間位置。居於上層者是經濟發達國家的中產或上流階層女性，她們僱用外勞照顧小孩，以幫助她們減輕家務負擔而投入職場，當後者離鄉背井照顧另一個家庭之際，她們的家務責任則仰賴底層的地方婦女來負擔。Arlie Hochschild (2000) 把這樣的照顧工作的層層移交，巧妙地比喻為「全球裸姆鏈」(global nanny chain)。地球村中的國際、階級不平等，已然轉換為日常生活中家庭生活照顧品質的不均等。

菲律賓當地的家務勞工是握有較少經濟、文化資本的女性；她們沒有充分的資格或不能負擔尋找海外僱主的成本。我 1999 年在菲律賓的一個小鄉鎮，遇到一個從事家務工作的菲律賓女人，她的月薪只有菲幣 500 元(相當於當年的美金 17 元)。當我問她是否想過出國工作，她以破破的英文回答我：「Me? no money!」長期以來，家務服務是在菲律賓女性的大宗有薪工作，在 1975 年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女性受僱

於家務服務 (Eviota 1992:88)。在主要城市女傭或褓姆的平均每月薪資大約是非幣 1,500-2,000 (美金 30-40 元)，在其他鄉鎮薪資更低。在菲律賓家境優渥的家庭主婦通常僱用數個賦予專職的家務勞工。除了寄宿在家中的「yayas」(褓姆) 和「helper」(家務幫手)³¹，許多另外以寄宿或日工的方式僱用廚子、司機、洗衣婦。

當地的家務勞工多來自外省的農村地區，都市裡的家務工作提供他們逃離家鄉的貧窮並步入城市中產階級生活的途徑。在 Josie 家中，我遇見好幾位她從 Visaya 招募來到馬尼拉，正在等待被安置於僱主家的當地家務勞工。比起我在台灣認識的「菲傭」，她們由於長期從事農事工作，膚色明顯地較為黝黑，也較難用英文溝通。當我問到為什麼會想要離家來幫傭，一位不到四十歲、小學畢業、已經生了八個小孩的媽媽告訴我在外省務農生活的財務困難，然後，她眼神發亮地說：「而且，我想看看馬尼拉的生活！」

無論在海外或國內的市場，家務雇用是菲律賓女性主要的工作機會。這個女性化的職業同樣提供了她們離開故鄉、接近都會生活的可能，然而兩者所面臨的生活機會 (life chances) 仍有相當差距。海外勞工因為領取國外較高的薪資而提高其勞動價值；經濟上的收益讓她們可以移轉其家務工作給菲律賓更貧窮的女性。透過消費成就的女主人身分，標示她們在家鄉的上層社會地位，也為她們在國外做女傭工作的低社會地位帶來心理補償。在某個程度上，海外的家務雇用為遷移勞工創造了改善經濟生活的機會；但對當地的家務勞工而言，女性化的家務工作仍然被是一個低薪資與污名化的職業。

6.3 現在及未來

Judy, 27 歲，單身，是家中九個小孩中最小的一個。她主修護理

31. 在菲律賓，家務勞工一般被稱為「helper」，這個稱呼不僅指稱助手及支援的關係，也蘊含擬似封建主義的恩庇侍從 (patron-client)，下屬對主人是順服從屬的關係 (Dumont 2000)。

的大學學位是由三個姐姐在台灣做女傭賺錢所資助的。然而，在做了兩年助產士後，爲了獲得較高的薪水她跟著姐姐來台灣工作。如同其他外籍家務勞工，Judy 對她在國外的向下流動感到遺憾，但仍認爲這個決定是值得的。她對我解釋，即便付出若干情緒上的代價，暫時性的卑賤工作的確提供了更大的經濟收益：

在國外工作很好，因爲在菲律賓工作十年，你還是沒有錢。大部分在國外工作的人是高等教育程度，他們只是想要更高的薪水。

但你的學位就浪費了？

我當然希望能運用我的知識在菲律賓工作，但我不可能賺這麼多錢啊。再說，在國外工作不是長期的，你只是做六到八年，然後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意。

真的有很多人在做生意嗎？

那我就知道了。

暫時性(temporality)，是多數遷移勞工理解其海外工作的框架，經由短暫過渡的艱苦旅程，他們期待在累積一定資金後可以得到永久性的向上流動。他們想像在國外辛苦工作後可以享受放鬆的生活，甚至做著「身分逆轉的幻想」(fantasy of reversal)——返鄉之後可以翹著二郎腿在家中享受自己的女傭的服務(Parrenas 2001:172)。「開始做生意」(starting a business)則是遷移勞工描述未來藍圖的常見說法，這樣一種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文化敘事(cultural narrative)

(Somers and Gibson 1994)，相當程度地影響她們對於自身階級認同時序性的理解——暫時困於險灘的外籍幫傭將轉換爲未來衣錦榮鄉的小頭家。然而，像 Josie 這樣能夠脫離外籍女傭的身分的個案其實是少數，成功經營生意的比例也很有限，許多返鄉的外勞其實是再度置身於國際勞動遷移的洪流中。

「開始做生意」，通常指的是傳統的小商品生產生意，例如 Jeeps (吉普公車)³²、三輪車及 *sari-saris* (街角的小型雜貨店)。極少數的人投資在較複雜的經濟活動或是運用他們在海外工作所獲得的技

術訓練。人類學家 Rual Pertierra (1992) 指出兩個因素來解釋返鄉勞工（當地人用 Tagalog 稱呼為 *balik-bayan*），對小商品生產投資的偏好。第一，這些投資形式可以象徵地具現他們在經濟不發達的當地社會中的相對富裕地位。第二，這些投資可以滿足家族成員期望共同分享或管理經濟收益的需求。返鄉的女性勞工購買的吉普車和三輪車，通常是由她的兄弟或丈夫來駕駛。Balik-bayans 在返鄉之後通常沒有正式的工作，或至少在剛返鄉的前幾個月會在家休息，以此彰顯出他們在地方上的相對優越地位。而她們立志創業的抱負經常隨著時間而磨損，因為他們在國外工作存的錢逐漸被出國過程中的負債、親朋好友的借貸、以及維持家中的生活及消費品消耗殆盡 (Barber 2000; Paz Cruz and Paganoni 1989)。

2002 年 2 月，田野工作結束後的二年半後，我去菲律賓拜訪幾位報導人朋友。她們大部分處於無業或等待出國工作機會的情況，也有一部分的人已經移居到香港、以色列或加拿大繼續海外家務勞工的生涯。其中一位從菲律賓寫信給我，希望我能介紹在台灣的工作機會。當我問她為什麼沒有如當年她計畫的在菲律賓安置下來，她回信這樣說：

我知道我原本說不打算回去，但這是唯一讓我賺錢的方法，我們別無選擇只有走向老路。假如你是一個在國外工作過的人，你會很難調整接受菲律賓的生活型態。你不能接受在這裡的薪資。你覺得錢太少了不習慣。然後誘惑就進入你的心裡——假如海外有機會何不再出國工作？

對於「可生活」(livable) 的薪水的標度總是和社會建構及個體期待的生活費用成正比。當海外勞工已習慣在地主國的薪資水平及生活形態後，他們通常發現很難適應於菲律賓當地的微薄薪水。而且，回到國內的勞動市場，他們通常必須從基層開始，因為其人力資本的價

32. Jeepneys 是私人擁有的中型卡車（有坐位和帆布蓋），依循固定路線載客。

值在長期出國從事非技術或半技術的工作後已貶值。Jovita, 29 歲、單身，是一個海外勞工口之的「ex-Taiwan」或「ex-abroad」，她曾以假名申請來台以規避台灣政府的單次入境規定。³³當她的第二次合約頻臨結束時，她對於下一步該往哪裡走感到徬徨：

你要做什麼？你會再來台灣嗎？

不，我在台灣的經驗夠多了——五年了！我的僱主要我改名〔再回來〕。我說我已經厭倦改名字。我擔心當我回家那時候我會忘記自己的名字〔笑〕！

所以你會留在菲律賓？

也許吧，我真的不知道。〔在菲律賓〕我必須從基層幹起。我想到薪水就覺得很困難，尤其當我已經習慣這裡〔台灣〕之後。

由於無法適應於菲律賓當地勞力所得的水平，Jovita 的生涯流動傾向於再度投入家務勞動的全球市場，她在尋找前往加拿大和香港工作的可能機會。像這樣的在不同地主國之間循環流動的軌跡是許多菲籍移工的共同經驗。某個星期天在我從事田野觀察的教會，Eva 即將結束在台灣的合約而準備去加拿大開始下一個家務工作。許多菲律賓同鄉圍繞在她身邊，恭喜她並熱切地詢問她如何獲得在加拿大工作的合約。Eva 帶領大家進行午餐前的禱告，她的禱告辭是這樣的：「天父，謝謝你讓我在加拿大得到新工作。我希望能幫助這裡所有的 *kababayans* (Tagalog 語的同鄉) 在結束台灣的工作之後能找到下一個工作……」

雖然大部分的移工認為出國工作只是解決經濟困境的暫時策略，然而她們的流動軌跡經常演變成在不同地主國之間的循環流動。即便他們在母國擁有一定的專業背景，許多海外家務勞工被困在 Evelyn Nakano Glenn (1981) 所說的「職業貧民窟」(occupational ghetto)。

33. 這項規定自 2002 年起略有放寬，台灣政府已修法允許「無不良紀錄」的外勞再度回台灣工作三年。

他們很難跳脫這項卑微的職業類別，而向上流動的定義變成尋找下一個工作及生存條件更好的地主國。菲籍海外家務勞工的工作地點可分為四個不同的層級。最底層是在中東國家，那裡的外勞人權和勞動條件並不佳但是進入的障礙最低。³⁴第二層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兩個地主國提供的外勞薪水高於中東（每月約 130-200 美金），³⁵通常吸引的是經濟資源和教育背景有限的外勞。第三層包括台灣和香港，外籍勞工的薪水受每月最低工資約 480 美元的保障，³⁶到這兩個國家的外勞通常是有足夠教育背景的中產階級。最高層則是加拿大，其提供外籍家務勞工的薪水較亞洲國家高，³⁷最重要的是外勞在兩年暫時性的工作居留後，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申請移民的機會。³⁸

跨國移工對不同地主國的偏好主要是受到當地的薪資水平的影響，但他們也考慮該當地的仲介費用的高低，其額度通常與薪資成正

34. 根據我訪問的海外菲籍家務勞工，在中東她們的月薪約 100 美元或更低。1997 年 NGO 報導該地區的仲介費為 500-1,500 美元 (Asian Migrant Centre 1998:43)。

35. 1998 年，在新加坡的外籍家務勞工新合約開始時的月薪約新幣 200-300 元 (133-200 美元) (Yeoh, Huang and Gonzalez 1999:117)。1994 年，在馬來西亞給印籍女傭的月薪約 RM300-330 (117-129 美元) 菲籍女傭則為 RM500 (196 美元) (Chin 1998)。這兩國的外籍家務勞工包括顯著比例的鄉村人口。Christine Chin 在馬來西亞訪問的 136 位外籍家務勞工中，超過 85% 來自菲律賓呂宋島的中南部及印尼的爪哇島的鄉村地區。

36. 香港的外籍家務勞工自 1994 年後的最低工資為港幣 3750 元 (485 美元)。台灣的最低工資亦相近：台幣 15840 元 (480 美元)。即使香港和台灣政府有基本工資的規定，但這兩國的外勞仍不乏遭遇薪資不足及其他與錢相關的勞資糾紛 (Constable 1997; Lan 2000)。

37. 加拿大的外籍家務勞工可領加班費而且每小時有最低薪資的保障 (1995 年 10 月頒布的規定為每小時美金 7 元)，每周工作超過四十小時，多餘的時數可領取一倍半的加班費 (每小時 10.5 美元)。在此最低薪資標準下，扣掉稅、保險、住宿及交通費 (約 300 美元) 後，每周四十小時約可領取美金 650 元。但這些規定並沒有被有效的強制實施，也曾有外籍家務勞工每月淨收入僅 800 美元 (Pratt 1999:28)。

38. 在此期間該家務勞工被政府限制必須寄宿在合約中規定的僱主家工作，更換僱主及勞資爭議都會造成外勞的「不良紀錄」。加拿大政府並要求引進的外勞必須精通英語或法語、擁有等同於加拿大十二年級的教育程度、並受過六個月完整的看護訓練。這些新規定被當地的 NGO 批評是歧視第三世界的女性移民。1999 年透過加拿大政府申請引進的外籍家務勞工中，菲籍勞工即佔了 68% (England and Stiehl 1997:200-2)。

比。地主國的階層序於是變成外勞向上移動的階梯。許多在台灣工作的外勞先前在中東、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工作過；基於先前在海外工作經驗所累積的資本，她們得以負擔來台灣的高額仲介費，而在台灣工作時，他們繼續存錢以尋找機會到勞動條件更好的國家工作。

遷移勞工體制的一個特點在於勞動力本身的維持 (maintenance) 與下一代勞動力的更新 (renewal) 是被安置在不同的地理空間與政治國度 (Burawoy 1976)。如前所述，爲了提供子女更好的教育及物質生活，是許多父母出外工作的主要動力。對這些海外勞工而言，階級流動的定義不一定是本身的流動，而是代間的流動。Shiela，四十歲、兩個孩子的媽，在菲律賓是家庭主婦，爲了籌募兩個女兒的大學學費到國外工作。在她五年的外籍女傭生涯中（先在沙烏地阿拉伯然後到台灣），她爲了下一代向上流動的機會而忍受在地主國工作的艱困與孤獨。她打開皮夾裡的女兒照片，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她們的身高體重、交友生活。她嘆了一口氣、苦笑著說：「我的女兒明年要畢業了。我非常驕傲。我是個女傭，但我女兒將成爲老師！」

另一個外勞媽媽 Madeline，四十初頭，在菲律賓有兩個孩子。在 1993 年與丈夫分居不久後來到台灣，第一個合約結束前她離開合約雇主的家，變成所謂「逃跑外勞」，爲的只是能多留在台灣幾年，不用再非法更換名字、以及支付昂貴的仲介費。轉眼間，她已經離開孩子有六年之久，訪談之際，她準備離開台灣回家，好在六月參加她女兒的大學畢業典禮。當我問她是否會再度出國工作，她毫不猶豫的回答：

當然！我必須再度出國工作。當你習慣在國外工作，我不知道在菲律賓可以做什麼。那裡沒有工作。

這些年你存了很多錢嗎？

沒有，我付女兒上大學。她是我最大的資產。我能秀給別人看我的女兒！

那你會希望女兒去國外工作嗎？

如果她想去。我喜歡台灣。也許我會帶女兒來這裡，在工廠工作。

上節已經指出，跨國移工在親朋鄰居面前，通常是選擇性地呈現出國工作中較正面的經驗，如此一來也影響到海外勞工的子女或兄弟姐妹對於出國工作的文化想像。他們通常會跟隨父母或兄姐的腳步前赴海外這個想像中充滿機會的國度（the promised land）。Madeline 這幾年在國外工作累積的「最大資產」—她的女兒—可能也即將成為未來的遷移勞工。簡言之，雖然大部分的菲籍遷移勞工視國外家務工作為暫時性的職業軌跡，期待能夠帶來她們在未來或是下一代的階級流動，但事實上，只有少數人能順利脫離這個「職業貧民窟」，多數人滯留在不同地主國間的循環流動；而遷移勞工的經驗對其子女生涯選擇也有相當的影響，結果經常在世代間複製了類似的遷移軌跡，為全球經濟繁衍了下一代的跨國移工。

7. 結論

本篇論文針對台灣社會學界近年來萌芽的跨國移工研究，希望突顯兩個尚未被分析的主題：流動與認同。的確，台灣的政策環境造成了外籍勞工的邊緣地位，她／他們的工作位置，更受錮於不平等的勞雇關係及剝削的勞動條件。然而，遷移勞工的階級位置與認同，遠比「外勞」或「菲傭」這樣的範疇更為多元複雜。當席捲入國際分工的勞動力浪潮，遷移勞工的工作與生活涵蓋跨國度的社會場域，其階級位置與認同也是由多重的時空座標所參照定義。「菲傭」的勞動位置界定了她們在地主國、雇主家此時此地的身分認同，但她們在星期天放假、在母國探親、在未來的流動軌跡等自我版圖裡，指涉、形構其他的主體認同。

前文已經指出，許多菲律賓的海外勞工，在母國從事的是低層中產階級的白領工作。她們之所以決定出國擔任家務勞工，不只是基於母國與外國的薪資所得落差，也是藉此突破女性在菲律賓勞動市場中的生存困境，並且期望實現對於更好的生活的後殖民文化想像。然而，海外工作雖然帶來薪資收入上的增加，在家鄉的身分地位的提升，遷

移勞工在地主國却同時要經歷種族歧視的羞辱，以及因為家庭幫傭這項職業的污名所導致的地位滑落。

面對這樣的衝突階級流動，菲籍家務移工發展出若干實踐來協商她們的自我認同。她們藉由時空版圖的延伸來脫離目前身為外籍女傭的污名。本研究發現，外籍家務勞工將在台灣的生活區分為前台（工作日）與後台（休息日），平日在雇主的監控管轄下，扮演女傭的謙卑角色，到了星期天，則透過截然不同的打扮與活動，將公共空間轉變為具有相對私密性的後台。另一組前後台，則是她們在母國與地主國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地位，在菲律賓家鄉親友的面前，她們透過物質收益的展現扮演成功致富的海外英雄，在地主國的辛酸則被隱匿或淡化為後台的秘密。此外，她們視海外家務工作為暫時的犧牲妥協，預期自己或下一代在未來能成功創業、向上流動，或至少遷移到較為層級較高的地主國工作。

這些菲律賓女性在不同生產關係位置間的流動，揭露了公私領域的多重交錯。她們從無酬的家務勞動者，轉化為有酬的家務勞工，而私人家戶成為她們的海外職場。她們的階級認同不只是透過她們的勞動身分來界定，也透過她們的消費行為的中介。在地理空間（地主國／母國）或社會空間（雇主家／外出）的區隔下，私人消費成為她們一種反抗雇主控制、脫離職業身分、展現自我認同的培力實踐。作為勞動者也是消費者的海外勞工，被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的過程，既是剝削箝制也是引誘解放。

總而言之，對於遷移勞工而言，出國工作不僅是一個身體移動、社會位置變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主體認同重新形塑、開展多重自我版圖的過程。在全球化的惡水中穿越國界的勞動者，受制於國族、階級、性別締連而成的種種結構地景，雖然面對侷限的制度空間以及高壓的勞動控制，她們在日常生活中仍開展出主體能動的空間，透過其地理遷移以及社會流動的軌跡，交織成一幅複雜流動的跨國界生命地圖。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朱明琴，1996，《台灣菲傭與雇主的互動關係》，台北：台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 吳介民，2002，〈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的集體認同形塑〉。未發表文稿。
- 吳挺鋒，1997，《「外勞」休閒生活的文化鬥爭》，台中：東海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 林秀麗，2000，《來去台灣洗 BENZ ——從台中地區菲籍女性家戶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實踐談起》，台中：東海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 林津如，2000，〈「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九期。2000年9月。
- 勞委會，1999，《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台灣地區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2002，《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勞動統計月報九十一年一月》，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劉梅君，2000，〈「廉價外勞」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八期，勞工與全球化專題。2000年6月。
- 藍佩嘉，2002，〈女人、差異、認同〉，台大社會系學會《社邊廢》第二期，<http://140.112.156.5/~pclan/html/report-set.htm>。

英文部分：

- Abella, Manolo. 1993. "Labor Mobility, Trade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3):167-249.
- Alegado, Dean Tiburico.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from the Philippines*. Ph.D. diss., Hawaii University, Manoa.

- Asian Migrant Centre. 1998. *Asian Migrant Yearbook 1998: Migration Facts, Analysis and Issues in 1997*. Hong Kong: Asian Migrant Centre Ltd.
- . 2001. *Asian Migrant Yearbook 2001: Migration Facts, Analysis and Issues in 2000*. Hong Kong: Asian Migrant Centre Ltd.
- Asis, Maruja. 1992. "The Overseas Employment Program Policy." In *Philippine Labor Migration: Impact and Policy*, edited by G. Battistella and A. Paganoni, pp. 68-112. Quezon City: Scalabrinia Migration Center.
- Barber, Pauline Gardiner. 2000. "Agency in Philippine Women's Labour Migration and Provisional Diaspor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3(4):399-411.
- Basch, Linda, Nina G. Schiller, and Cristina S. Blanc. 1994.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tion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1-47.
- Burawoy, Michael. 1976. "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5):1050-87.
- Calhoun, Craig.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 Calhoun, pp. 9-36. Oxford: Blackwell.
- Chang, Kimberley A., and Julian McAllister Groves. 2000. "Neither 'Saints' nor 'Prostitutes': Sexual Discourse in the

-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 Community in Hong-Kong.”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3(1):73-87.
- Chant, Sylvia, and Cathy McIlwaine. 1995. *Women of a Lesser Cost: Female labour, Foreign Exchange, and Philippine Development*.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 Chin, Christine. 1998. *Service and Servitude: Foreig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and Malaysian “Modernity Pro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nstable, Nicole. 1997. *Maid to Order in Hong-Kong: Stories of Filipina Work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amaso. 1991. *Philippine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Situations*. Bangkok: ILO-ROAP.
- Dumont, Jean-Paul. 2000. “Always Home, Never Home: Visayan ‘Helper’ and Identities.” In *Home and Hegemony: Domestic Servi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K. M. Adams and S. Dickey, pp. 119-13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England, Kim, and Bernadette Stiehl. 1997. “They think you’re as stupid as your English is: Constructing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Toronto.”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195-215.
- Espiritu, Yen Le. 1995. *Filipino American Liv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Eviota, Elizabeth, Uy.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Gender, Women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hilippines*. London: Zed Books.
- Findlay, Allan M., Huw Jones, and Gillian M. Davidson. 1998. “Migration Transition or Migration Transformation in

- the Asian Dragon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2(4):643-663.
- Friedmann, John.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69-83.
- Glaeser, Andreas. 2000. *Divided in Unity: Identity, Germany, and the Berlin Poli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lenn, Evelyn Nakano. 1981. "Occupational Ghettoizations: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and Domestic Service, 1905-1970." *Ethnicity* 7(4):352-86.
- Go, Stella. 1993. *The Filipino Family in the Eighties*. Manila: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e La Salle University.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Hochschild, Arlie. 2000. "The Nanny Chain." *The American Prospect* 11(4):32-36.
- Hondagneu-Sotelo, Pierrette and Ernestine Avila. 1997. "'I am Here, but I a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 Society* 11(5):548-571.
- Isreal-Sobritchea, Cayolyn. 1990. "The Ideology of Female Domesticity: Its Impact on the Status of Filipino Women." *Review of Women's Studies* 1(1):26-41.
- Lasch, Scott and Jonathan Friedman. 1992. "Introduction: Subjectivity and Modernity's Other." In *Modernity and Identity*, edited by S. Lasch and J. Friedman, pp. 1-31. Oxford: Blackwell.
- Lan, Pei-Chia. 2003a. "Maid or Madam? Filipina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 *Gender &*

- Society*. In press.
- . 2003b. “‘They Have More Money but I Speak Better English!’: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between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aiwanese Employers.”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In Press.
- . 2002. “Sculpting Social Boundaries and Inequalities: The Micro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Domestic Employment in Taiwan.” Manuscript under review.
- . 2000. *Global Divisions, Local Identities: Filipin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aiwanese Employers*. Ph.D. dis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
- Massey, Douglas, G. Hugo J. Arango, A. Kouaouci, A. Pellegrino, and J. Taylor. 1998.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edina, Belinda. 1991. *The Filipino Family: A Text with Selected Readings*.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 Press.
- NCRFW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Roles of Filipino Women) . 1993. *Filipino Women Migrants: A Statistical Factbook*. Quezon City: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Roles of Filipino Women.
- Nippert-Eng, Christena. 1996. *Home and Work: Negotiating Boundaries through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 Parrenas, Rhacel Salazar.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Stanford

- d University Press.
- Paz Cruz, Victoria, and Anthony Paganoni. 1989. *Filipinas in Migration: Big Bills and Small Change*. Quezon City: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 Pertierra, Raul. 1992. *Remittances and Returnees: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Migration in Ilocos*.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 Pratt, Geraldine. 1999. "Is this Canada?: Domestic Workers' Experiences in Vancouver, BC." In *Gende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Service*, edited by J. H. Momsen, pp. 23-42. London: Routledge.
- Rollins, Judith. 1985. *Between Women: Domesticity and their Employer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Romero, Mary. 1992. *Maid in the U.S.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alzinger, Leslie. 1991. "A Maid by Any Other Nam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rty Work' by Central American Immigrants." In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Modern Metropolis*, edited by M. Burawoy, pp. 139-1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ssen, Saskia.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2.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keldon, Ronald. 199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in and

- from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 Review Essay."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19-63.
- Somer,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 Calhoun, pp. 37-99. Oxford: Blackwell.
- Tarcoll, Cecilla. 1996. "Migrating 'For the Sake of the Family?' Gender, Life Course and Intra-Household Relations among Filipino Migrants in Rome."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 44(1-4):12-32.
- Yeoh, Brenda, and Shirlena Huang. 1998. "Negotiating Public Space: Strategies and Styles of Migrant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Urban Studies* 35(3):583-602.
- and Joaquin Gonzalez III. 1999. "Migrant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Debating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3(1):114-136.
- Young, J. P. 1980.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an Ilocano Community*.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